

加强基础研究 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中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委员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作为一所为“两弹一星”事业而创办的红色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始终围绕“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的任务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多下功夫，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水平，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锚定原始创新，打造基础研究的“策源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中国科大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科教报国信仰，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持续在基础性、战略性领域深耕细作，以原始创新筑牢科技创新的底座。

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有组织科研。世界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荟萃、创新资源集聚、研发平台广布等优势，扎实推进有组织科研，更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国科大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为牵引，聚力推进有组织科研，力争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学校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构建了“自由探索、任务驱动、重大产出”的多层次创新体系，重点实施基础研究“理实工程”，围绕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生物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必争领域，集中优势力量攻关创新，走出一条以有组织科研驱动重大原始创新的新路，近年来陆续产出“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九章”系列光子量子计算机、“祖冲之”系列超导量子计算机等诸多代表性原始创新成果。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以基础研究引领学科布局。学科体系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大坚持“基础学科率先引领、新型工科跨越发展、生命医学融合发展”的思路，持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11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基础学科在新一轮学科评估中全部表现优异。学校聚焦科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新兴、急需、紧缺专业超常布局，持续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新增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等13个新兴交叉专业和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量子科学与技术、行星科学与探测技术等5个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系统重构基础学科生态。“十五五”时期，学校将围绕量子科学与技术、先进核能、人工智能、新材料、深空探测等八大主攻方向打造世界一流学科，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赋能。

优化体系布局，搭建基础研究的“硬支撑”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高水平建设国家实验室和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效发

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科大坚持“顶天立地”的科研布局，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能级持续提升。

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锻造“国之重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支撑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石。中国科大坚持科学规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扎实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作为主要依托单位之一，学校深度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和合肥国家实验室建设，联合共建深空探测实验室；牵头或共建合肥先进光源、超级陶瓷装置、墨子巡天望远镜、空地一体量子精密测量实验设施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研究院、大健康研究院等高能级平台建设。这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和建设，将有力支撑我国基础研究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跨越。

坚持人工智能驱动，引领基础研究范式变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基础研究格局，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的科研范式变革将成为贯通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关键变量。中国科大在人工智能驱动的首个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领域率先布局，研制出全球首个数据智能驱动的全流程机器化学家，推动基础研究模式向“设计—合成—表征—分析”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运行跃迁，致力于用AI攻克物质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让基础研究步入工程化、平台化、开放共享的新阶段。同时，学校将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入培养体系，在夯实数理基础、强化交叉融合的传统优势之上，全面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与跨学科创新能力。

抢抓“第一资源”，夯实基础研究的“人才底座”

中国科大以基础研究需求为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引育并举建设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夯实基础研究

的“人才底座”。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蓄水池”。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大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重点学科领域，拓宽引才渠道和创新引才模式，加大力度精准引进国际顶尖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近年来，学校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构建了全链条的青年人才接续培育体系，以“创新基金”支持青年学生和教师开展“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以“领军人才项目”为青年学者提供“十年磨一剑”的稳定支

持；持续推进学校、学院和青年教师“三位一体”的青年人才培养工程，畅通青年人才发展通道，鼓励和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培育基础研究的后备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中国科大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把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基础宽厚实、专业精新活”的特色办学传统，聚焦国家急需领域，以“宽口径、厚基础”的通识教育夯实扎实的数理基础，通过本硕博一体化贯通设计保障长周期培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学校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探索“科教融合3.0”模式，努力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示范区；深入实施“一特区两工程”，在基础和前沿交叉学科、急需紧缺领域，实施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探索重大科技任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在科技攻关实践过程中锻造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把丰富科研资源转化为强大育人合力。

深化首创性差异化改革，释放基础研究的“制度动能”

中国科大深刻把握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特点，通过深化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破解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为科研人员营造潜心探索的学术生态。

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激发基础研究人才创新潜力和活力。立足新发展阶段，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发挥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导向牵引作用，充分激发基础研究人才的创新潜力和活力。中国科大坚持以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探索实施长周期柔性考核机制。学校以“阶段评价”代替“年度考核”，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评”，对高层次人才通过学术交流会进行3年至5年的阶段性总结，重点关注代表性成果的创新点和意义；积极破除“帽子”异化使用等不良倾向，设立科技成果评价专业委员会，完成科技部“建立科技成果五元价值评价机制”专项试点任务；着力营造“养人”的创新环境，培育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学术生态，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挑战前沿科学难题、冲击“从0到1”的原创突破。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从科学到应用的关键环节，也是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中国科大以国家赋权改革试点为契机，创新性提出“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赋权改革模式，将传统的“先转化、再奖励”模式，改革为科研团队凭借全部知识产权作价入股、学校通过转让协议享有知识产权未来收益的新模式，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这一创新模式，实现了“谁研发、谁受益”，形成了“基础突破催生技术成果、技术转化反哺基础研究”的良性循环，相关经验得到全国多地复制推广，为学校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未来，学校将进一步深化“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机制，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倾力打造城校命运共同体

■ 吴照明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作为扎根铜陵、服务安徽、辐射长三角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铜陵学院以转型破局，以融合聚力，以跨越争先，全力打造城校命运共同体，为教育强国、美好安徽、幸福铜陵建设贡献力量。

转型破局，推动学科专业系统性重塑

“转型”是铜陵学院破解发展瓶颈、彰显办学特色、增强服务能力

的必然选择。学校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重塑，推动学校从财经学科为主转型为“工商一体、多学科协调发展”。

推进“工商一体化”转型，优化学科布局。学校确立“做新做大工科、做精做强商科、做特做优文科”改革思路，将4个工科学院拓展为6个聚焦前沿、对接产业的工科学院，将5个商学院整合为3个优势核心、特色鲜明的商学院，3个文科学院也优化了学科专业设置，形成“工科为主、商科支撑、文科特色”的学科专业新结构。围绕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

和铜陵市产业发展规划，前瞻性布局新材料、“智能+”、新商科三大特色专业群，涵盖20多个本科专业。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设立为“学科特区”，推动材料、控制、智能、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会计、数字经济、科技金融等专业与地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精准对接，提高学科专业建设质量。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供给与发展需求适配度。学校把“工科人才具备商科思维、商科人才具备工程素养、文科人才具备技术视野”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重塑课程体系。商科专业增设数据分析、智能制造认知等课程，工科专业开设经济学、管理学、经济法

等课程，文科专业融入数据可视化、AI工具应用等内容。构建“通识基础+专业核心+跨学科模块+项目实践”的课程体系，推行“四三三”理论课程结构（40%基础课、30%通识课、30%专业课），打造“3+3+3”课程群（工科专业设置3门以上商科课程，商科、文科专业设置3门以上工科通识课程，每个专业设置3门以上深度融合AI的课程和3门产教融合课程）。推进“六微”（微学科、微专业、微课程、微教材、微团队、微平台）改革，积极探索书院制、学部制改革，构建工商融合、数智赋能、产教协同、科教共生的育人体系。

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改革。学校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建强基础环境，优化发展生态，着力打造未来课堂、未来学校、未来学习

以学术研究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水平

■ 付琳

·文史纵横·

2026年5月19日 星期二
责编/徐海 杜婉 程铁军
版式/王艺林
联系电话：0551-65179227
投稿邮箱：ahrblb@163.com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既要解决“怎么救”“怎么传”的实践难题，也亟待回答“为什么救”“传什么”的理论追问。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术研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思考与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要根植于活态传承的土壤，重点关注对传承实践的系统观察、对传承人的深度访谈、对市场转化的动态把握，为保护传承提供理论支撑。

高等院校是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等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中承担基础理论与人才培养的核心职能。高校应当进一步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建设，打破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学科之间的壁垒，形成综合性的非遗研究范式；主动打开校门，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和教学研究；引导老师深入田野，与传承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实践现场发现问题、提炼理论；调整评价导向，将田野调查的深度、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纳入学术评价体系，引导教师走出“论文至上”的窠臼；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在学习阶段就接触真实的文化田野，培养既能做学问、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科研院所是应用研究的重要基地。科研院所，特别是文化和旅游系统所属的研究机构，以及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应将重心放在应用研究上。科研院所应主动对接政策需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难点、痛点开展针对性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行业规范研究方面，继续完善记录、建档、数字化等方面的技术标准，并推动这些标准在基层落地；加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的联系，把研究成果送到代表性传承人手中，转化为可操作的保护方案；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出版工作，定期发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报告，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参考，真正将智库优势转化为保护传承实效；加强国际文化专家队伍建设和中外智库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

专业性社会组织是连接理论与田野实践的桥梁。专业性社会组织，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民俗学会、传统工艺工作站等，应当发挥其“民间性”优势，成为连接理论与田野实践的桥梁。社会组织要主动深入基层，走进代表性传承人的工坊，把代表性传承人的困惑、诉求和智慧收集起来，转化为可供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的学术议题，引导学术理论研究聚焦真问题、解决真困难。在研究成果形成后，引导学术成果不能停留在撰写论文的阶段，而应当承担起“翻译”和“转化”的功能，将学术语言转化为代表性传承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操作方案，将研究报告提炼为政策建议和科普读物。社会组织还应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定期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学术会议，让各方在对话中找到合作的可能。

文化企业是市场转化与产业发展的实践主体。文化企业，特别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品开发、旅游运营、演艺策划的企业，应当成为学术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场。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采集、虚拟展示、数字建档、线上传播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应主动将学术研究中的图像记录标准、知识分类体系、口述史方法等转化为可操作的数字技术方案，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与广泛传播；在经济效益与学术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积极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学术研究成果引入产品开发、工艺改良、品牌建设等环节，让学术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开放自己的市场数据、用户反馈给研究者，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的研究素材；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平台，让学生在企业一线理解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实际需求。

政府部门是政策引导与资源统筹的主导力量。政府部门应当发挥政策引导与资源统筹的主导作用。相关部门要制定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建设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文化工程中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问题等，建立多学科研究平台；在资源分配上，通过专项资金、项目扶持等方式，支持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研究，鼓励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搭建多方参与的协作平台，定期组织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企业、代表性传承人座谈交流，推动各方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在协作中形成合力；建立有效的监督评估机制，对保护传承不力的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及时干预，确保政策落地不走样、资金使用不浪费。

除上述主体外，非遗保护还需要更广泛力量的共同参与。媒体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到公众面前，加强相关题材纪录片创作，办好有关优秀节目。文化馆（站）、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要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培训、展览、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积极引导群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各方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态。

(作者单位：安徽艺术学院)

研究中心、长三角绿色转型发展研究院，与铜陵市政府和江西理工大学共建铜产业研究院、与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共建工业设备智能健康监测高等研究院，承建教育部安徽高等研究院铜陵分院。联合北京科技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多方力量，聚焦电子级铜箔、高端铜板带、高性能铜基复合材料、铜基新材料增材制造与表面工程、铜基新材料数字化智能制造等五个方向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开展铜经济、铜文化、铜环境等前瞻性 and 对策性研究，推动科研项目从自由探索转向合力攻坚，赋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跨越争先，擘画“十五五”发展蓝图

转型是筑基，融合是路径，跨越是目标。对于铜陵学院而言，在“十五五”乃至较长一段时期里，实现办学层次与综合实力的历史性跨越，既决定了学校的生存根基与发展空间，也决定了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水平。

明确跨越发展目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当前，铜陵市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高素质人才和高水平科技创新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学校作为铜陵市唯一的省属本科高校，必须加快实现办学层次跃升，实现“办学能力优质、服务区域优秀”，实现地方特色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

厘清跨越发展路径。学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十五五”事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地方特色应用型高水平大学”一个发展目标，“创建大学”一个中心任务，深化“五项改革”、实施“八大工程”、夯实“三大保障”的“11583”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学校系统规划了“四步走”中长期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地方特色应用型高水平大学。

增强跨越发展成色。学校要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转型发展、特色发展、融合发展、内涵发展为路径，实现跨越发展。要深化“工商一体化”转型，建设“工商一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要发挥“沈浩先进事迹”“地方首位铜产业”和“工、商兼备的学科体系”三大“人无我有”的办学特色；要进一步健全全校地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通过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数字教育、教育评价、人事分配制度的五项改革，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水平和科技服务能力，切实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全力推进城校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作者系铜陵学院党委书记)